

《二十一世紀》創刊三十周年 感言

張隆溪

根據加拿大菲沙研究所 (Fraser Institute) 2020年發布的「世界經濟自由度」(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報告，香港在全世界居首位，以下是新加坡、新西蘭、瑞士、澳大利亞，美國位居第六，英國第十三。菲沙研究所又另與美國華盛頓的卡托研究所 (Cato Institute) 以及德國弗里德利希·瑙曼自由基金會 (Friedrich Naumann Foundation for Freedom) 屬下的自由研究所 (Liberales Institut) 合作，發布「人類自由指數」(Human Freedom Index)，在2019年的報告中，香港也名列前茅，在新西蘭和瑞士之後，居第三位，下面依次是加拿大、澳大利亞，丹麥和盧森堡同列第六，英國位列第十四，美國則居第十五位。由這些西方重要的智庫依據發達國家和民主社會各項指標作出的評級，可以幫助我們跳出香港，以國際和世界的眼光來反觀香港，更清楚地認識到香港人享有的自由，其實在英國人和美國人之上，從而認識到香港特殊的地位和所取得的成功。立足於香港這一方自由之土，作為一份關注思想文化的學術刊物，《二十一世紀》自1990年10月創刊伊始，就有一種自覺的擔當，也是世界各地許多華人知識份子共同的期許，那就是讓這份刊物團結海內外知識份子，為中國文化未來的發展作出貢獻。

回顧過去三十年，《二十一世紀》在學界的確建立起了崇高的聲譽，發表過許多有分量、有影響的文章。隨着不同時期世界局勢、尤其中國內地的發展變化，其影響和作用在不同階段也有所不同。刊物



創辦之初，正值八九民運之後，國內嚴峻的政治氛圍使香港的自由環境顯出其特殊的優越性，《二十一世紀》在上世紀整個90年代，為不受任何干擾的學術自由提供了一片多元而開放的園地，也獲得了中文學界普遍的尊重。90年代也是中國經濟改革加快步伐的年代，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的發展更可謂突飛猛進，跨過邊界的深圳就是一個最有說服力的見證。這個文化大革命結束時還不過六十萬人口的小漁村和小鄉鎮，四十年間人口超過一千多萬，集中了來自全國各地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和中國高科技產業，成為中國的矽谷（硅谷）；無數高樓平地而起，變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世界大都市。深圳可以說就在香港人的眼皮底下，幾乎從無到有、由小到大不斷變化，到2018年，深圳市的本地生產總值（GDP）已經超過香港。2010年，整個中國的GDP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80年代可以說是思想解放的時代，對文革的反思和批判使當時的知識份子、甚至全體中國人的思想意識，都具有相對的統一性。然而，90年代經濟大潮洶湧澎湃，滾滾而來，衝擊了整個中國社會，也使之愈來愈多元。隨着90年代社會的多元和分層，知識份子也開始分化。一個具有象徵性的例證，就是圍繞着「長江《讀書》獎」的爭論而變得明朗的自由派與新左派之爭。在整個80年代，三聯書店辦的那冊小小32開本的《讀書》雜誌，其聲譽可謂如日中天，但90年代後半則發生變化，到2000年「長江《讀書》獎」發表評選結果，居然把獎頒給了《讀書》執行主編、評獎學術委員會召集人汪暉，因而引起軒然大波。那場爭論不僅有評獎程序出現的問題，更明顯暴露出中國知識界在思想意識上已經產生嚴重的分歧，最終涉及到對文革和文革前十七年的評價問題。近年隨着中國經濟發展取得驕人的成就，民族主義意識也相應崛起，某些人以強國為要點，以能否對西方說不為判斷是非的標準，於是走出鄧小平韜光養晦的年代，由大國到強國，取消了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在意識形態方面也逐漸加強控制；對於文革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不再有80年代那樣的批判精神，反而強調與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對抗態度，突出強人政治。於是，由市場操作和政治機遇結合，不僅出現了《中國可以說不——冷戰後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和《中國不高興：大時代、大目標及我們的內憂外患》這類暢銷書，也出現了「國父」論、「通三統」說，以及堅持「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不可分割、共產黨路線鬥爭乃是自我糾錯機制等宏論。這些爭論和變化都可以在「長江《讀書》獎」引發的爭議中見其端倪，看出趨勢。

無論如何，在那次爭論之後，《讀書》雜誌再也不可能擁有昔日的光輝和影響，而其他好幾種刊物的出現，在相對多元的環境裏，也使一花獨秀的境況再也不可能發生。90年代的中國出現了初步的市場經濟模式，而金錢、利益等價值觀念在社會大眾意識中也愈來愈佔據主導，大眾傳媒和數字化傳播方式構成對傳統紙質書刊的挑戰，而這些對人文精神的衝擊力度，似乎不亞於昔日意識形態控制之高壓。這一系列激烈而迅速的變化在《二十一世紀》中

都有討論，都留下了印迹，當然也不可避免會影響《二十一世紀》在讀者中所能起到的作用。在這種情形之下，相對於國內在思想意識方面趨於嚴厲的控制和限定，加上某些體制內學者心態的變化和很多人都十分厭惡的學術腐敗現象，香港的《二十一世紀》或可重新發揮其特殊的優越性。

香港一直是一個高度國際化的世界大都市，而近一兩年來國際局勢的變化，必然直接影響到香港社會。在不斷加碼、愈來愈激烈的中美貿易戰中，在中美關係處於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幾乎最低點的時候，香港社會也發生各種不尋常的事件，尤其2019年6月「反修例」（反對《逃犯條例》修訂）風波引發漸趨暴力和破壞性的示威騷動，直接干擾了香港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包括各大學甚至中小學校園。進入2020年以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在世界各地肆虐，更在政治的動盪之上，增加了瘟疫流行產生的對經濟和社會生活的負面影響。香港地方雖小，卻在中美角力和衝突中，佔有一個獨特的地位。我認為作為認同民主、自由，也認同中國和中國文化的知識份子，我們尤其需要獨立思考。我們看香港，也同樣應該跳出香港，以國際和世界的眼光來反觀香港，才可以更清楚地認識到香港發生的事情與國際局勢的變化之間，有怎樣明顯而直接的聯繫。

香港的問題說到底，就是「一國」和「兩制」的矛盾。一百七十多年前，大英帝國經過鴉片戰爭，用槍炮才把香港從滿清王朝治下變成英國的殖民地，但在1997年，經過中英談判，沒有放一槍一炮，香港就和平地回歸中國，這實在不可思議，但也不可避免地忽略或掩蓋了一些根本性問題。看來政權的轉移相對容易，而社會和個人心態的轉移則遠比一般人想像的要複雜困難得多。香港過去近一年中發生的暴力事件，以及本土主義甚至港獨的興起，在「一國」的框架下，是任何主權國家都不可能容許的，於是有香港《國家安全法》的公布和實施。但如何在「兩制」的框架下，使香港社會逐漸回復到法治、安全、繁榮的狀態，則又需要從政府到民間長期共同的努力。

在一個正常社會的正常情況下，政治不是、而且也不應該是知識份子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因為知識份子主要考慮的應該是自己的專業和學術。然而在慶祝《二十一世紀》三十周年時，頭腦裏擺脫不開的竟然是從周邊環境到世界局勢當中許許多多涉及地緣政治的問題，這是否說明我們正處在一個非常的環境和非常的時刻呢？在這種時候，也許冷靜的分析和獨立的思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而我寄望於《二十一世紀》的，是繼續為不受任何干擾的學術自由提供一片多元而開放的園地，能繼續團結海內外知識份子，為中國文化未來的發展作出貢獻。